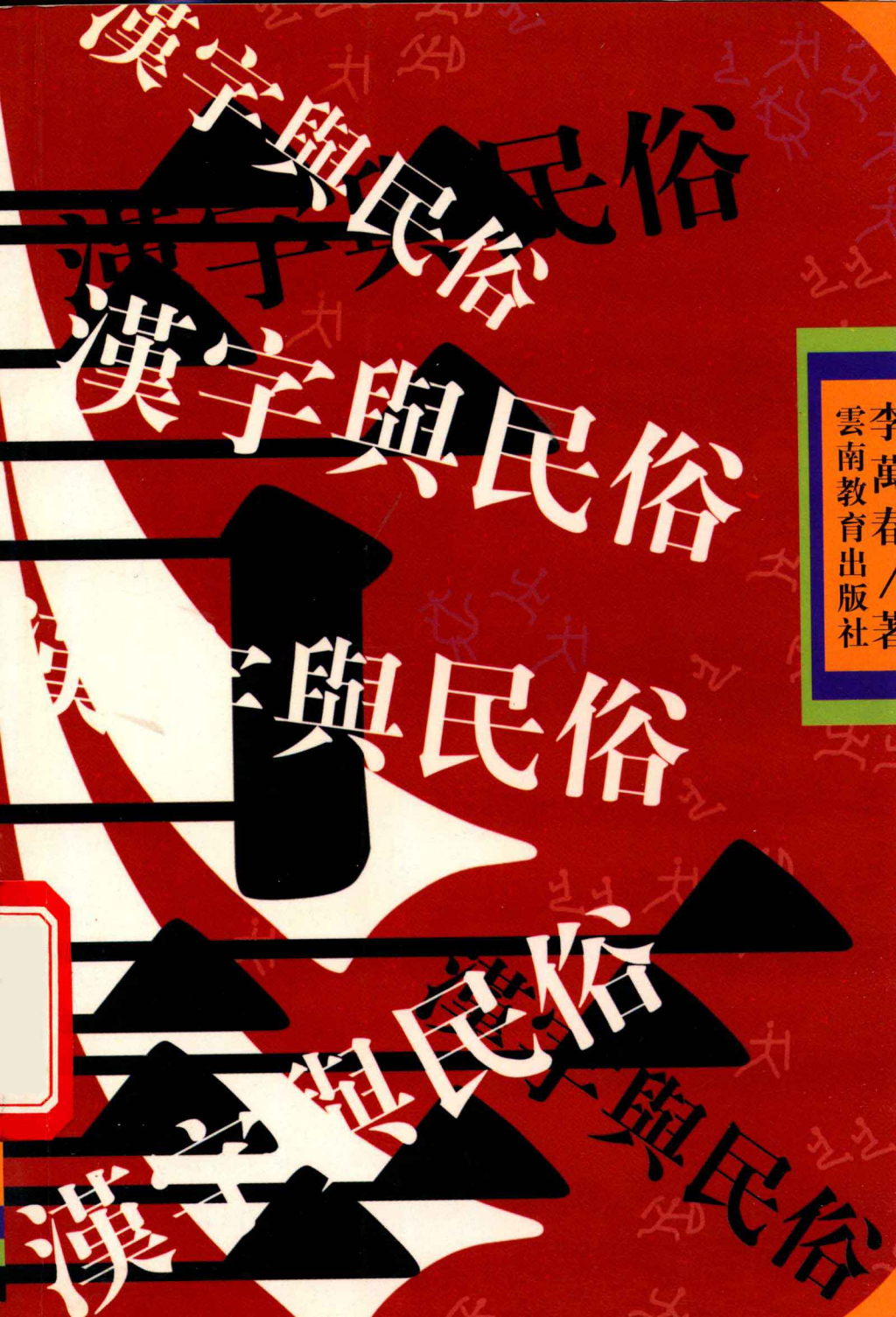




李萬春 / 著
雲南教育出版社



漢字與民俗

李萬春 / 著



雲南教育出版社

責任編輯：袁宜民

封面設計：吳 林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漢字與民俗/李萬春著 .—2 版 .—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
2001.6

I . 漢 ... II . 李 ... III . 漢字—字源—研究 IV . H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1) 第 23991 號

漢字與民俗

李萬春 著

雲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 (昆明市環城西路 609 號)

雲南農墾印刷包裝廠印裝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9.375 字數：210 000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數：3001—6000

ISBN 7-5415-0544-7/H·9 定價：15.00 元

修訂再版說明

拙著《漢字與民俗》得到雲南教育出版社的關心和支持，於1992年2月初版。不久，榮獲雲南省優秀社會科學著作三等獎。

令愚始料不及，從未想到過的是她一問世即受到師友、同仁和讀者的傾心和關注。迄今，雖事隔多年，仍歷歷在目，傾注之情，亦未斷絕。對此鼓勵和鞭策，我時時銘記於心，深深感謝各位摯友。

說句心裏話，她僅為一未具雛形的雕蟲之毫末，却激起如是深情，誠感愧報之至！不過，靜而思之，其所以如此，真諦在於漢古文字奇妙的構形及其所蘊涵的豐富、動人、精妙，受到了日益衆多的人們的贊許所致。

今天，雲南教育出版社決定修訂再版拙著，藉此機會再向傾注拙著的各位摯友表示衷心感謝，並感謝雲南教育出版社應讀者需求而再版。

著者

2001年3月26日

序（一）

李萬春君的新著《漢字與民俗》以其獨特的視角對漢字發生學作了深入細緻的探究，向讀者展示了絢麗多彩的古代民俗文化。

提及燦爛的中華古代文化，人們很自然地會聯想到浩如煙海的古代傳世文獻；近些年來，又將視野延伸到出土古文字文獻。可是，却很少有人屬意於古代漢字。或曰：漢字嘛，無非是記錄漢語的符號罷了，並無奧秘可言。或曰：幾萬個現代漢字還用不完呢，又何必去管幾千年前的古代漢字？

其實不然。

從漢字的性質特點方面來看，作為表意體系的語素文字，每一個漢字都是一個形與音義相統一的立方體，這就為蘊涵豐富的文化信息提供了客觀可能性。而從漢字發生學的角度來看，漢字又總是把造字法與表詞法集於一身，包容着造字心理和社會檢驗心理的全部心理流程。古今漢字概莫能外。每一個漢字都必須經過這樣的階段：製字者按照一定的方式把對人生社會的心理感受製作成字，這可以說是大腦認知的物化過程；所造字通行於世，就必然接受全社會的心理檢驗，以取得表詞方式的共識，這可以說是一種社會認知的物化回歸過程。這兩個階段緊密相連而又各具特點。前者突出地表現為造字的直觀具體性，後者則十分強調表詞的義理概括性。而造字的具體性

與表詞的概括性之間的矛盾運動又總是處於漢字發生發展的支配地位。例如“好”字。“美”與“好”在現代漢語中可以同義連語並列合成。許慎對“好”的解說：“美也。從女子。”徐鍇曰：“子者，男子之美稱。”這是把“子”與“女”作為等義看待。段玉裁則把許慎的訓語改為女子“色好”的“嫵”，並注曰：“好本謂女子，引申為凡美之稱。”這是把“子”與“女”作為偏義看待。“好”為什麼用一個“子”和一個“女”構成？“好”何以具有“美”義？其美意識的源頭究竟是甚麼？要回答這些問題，就不能不考察初民的文化心態。“好”甲骨文作，其中的與表示婦女分娩生育的（毓，育的初文）中的同類，均指成年女性；其中的與哺乳幼兒的（字）中的同類，均概指男女幼兒。原來，初民製作“好”字，既無意於“男子之美稱”，也無意於“女子色好”，而是以成年女性具有生育能力為“好”。這種審美意識深深根植於先民生育崇拜意識的土壤之中，因而世代流傳，相沿成習。我國西南地區一些兄弟民族仍保留着此類婚俗，成年男女婚前同居，待女方確有生育能力之後方得嫁娶。漢語中稱說女子“待字”一語也透露了這種民俗文化的消息。這就不難看出，漢字的造字表詞確實同民俗結下了不解之緣。

杜甫曾以“窗含”、“門泊”的藝術視角去盡收壯麗河山於眼底；而萬春君則憑借古漢字這一積澱着遠古文化信息的“活化石”去審視古代思想文化，尋繹先民風俗蹤迹，從而解開漢字之謎。可以這樣說，作為漢字文化學的一個分支，漢字民俗學已經顯示出它勃勃的生機。

李 圃

一九九一年七月於上海

序（二）

本書題名為《漢字與民俗》，顧名思義，本書是研究漢字與民俗的關係的。“漢字”和“民俗”這兩個概念都有着豐富的內涵和廣闊的外延，我們可以在本書裏看到它們之間有着必然的邏輯聯係。

“民俗”指的是民間的風俗習慣等文化現象。有了人類，就有了民俗。民俗包含的內容十分廣泛，它可以涉及一個民族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所以民俗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稱之為生活方式。儘管民俗內容極其廣泛，各個時代、各個地域的民俗千差萬別，但從人類社會結構來看，它不過是社會的上層建築，是社會意識諸形態之一。從時間上看，民俗又有古今之別。當然，一個民族的古今民俗，在多數情況下，是有源流關係的。本書雖着重介紹的是我國古代民俗，但流風所及，有的地方也不可避免地要說到現代的一些民俗。

民俗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它是以民間習俗為研究對象的。我國民俗學的研究起步較晚，“五四”運動以後，我國的一些民俗學者才第一次有計劃地搜集民間活動的民俗資料和口頭文學，並把它們作為一門科學來研究。我們可以說中國民俗學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發下才產生的。解放後，在相當長

的一段時間內，主要是民俗學的組成部份之一的民間文學得到了發展，而民俗本身的真正搜集與研究却因種種原因而被擱置。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民俗學在理論和分類學科的研究上才得到真正的發展。我國的古代民俗內容十分豐富，但由於歷史久遠，記載古代民俗資料的古代文獻又浩如煙海，因此，搜集、整理與研究的工作絕非一日之功。本書的撰寫就屬於這浩繁工作的一部份，雖然收字僅百餘，涉及古代民俗的方面也不夠廣，但是作為一種嘗試，也的確是難能可貴的了。

“漢字”指的是漢族人民用來記錄漢語的文字。“五四”運動以來，漢字遭受過不少誤解與非難。有人認為漢字滿身缺點，無一是處，有人甚至主張“廢除漢字”。其實，不論過去或現在，漢字對國家、民族與社會，都作過不可磨滅的貢獻。漢字功不可沒，與世界通行的各種文字比較，漢字的優越性是突出的。即以漢字的方塊性而論，隨着信息科學和電腦技術的發展，它的科學性也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了。今天我們對漢字有重新認識的必要。

漢字的產生已有五六千年的歷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以形表意的文字之一，其他兩種以形作符的古文字（古埃及的聖書字和古巴比倫的楔形文字）都早已消亡了，而我國的甲骨文却沿着甲骨、吉金、篆書、隸書、楷書的改革道路一直為我們服務到今天。漢字的這種形體變革是漢字發展的必由之路。漢字的音性性質並不意味着漢字要走純標音的道路，更不意味着要用另一種文字形式來代替漢字。任何取消漢字的想法都是行不通的。當前漢字改革的首要任務是進一步搞好語言文字的規範化、標準化工作。

漢字形體發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即古文字和今文字。本書所指漢字是指古文字，而且主要是指甲骨文。我們知道甲骨

文的出現距今已有三千幾百年的歷史了，從這些古老文字來看古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造字原則，漢字可以說是漢語的形像化，它把古人的文化傳承（古代民俗）形像地從古漢字的構造中具體地反映出來。從民俗角度說，古漢字中相當數量的甲骨文就是古代人民的民俗語彙，因此，古漢字是研究古代民俗的第一手資料。這是漢字對我們民族文化貢獻的一個方面，我們怎能不認真學習、研究它呢。

近代學者常常利用分析古漢字形體結構的方法，考證古代民俗現像。如王國維、郭沫若、袁珂等前輩學者就在這方面作出不少貢獻。日本學者白川靜先生著《中國古代民俗》，他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通過字形分析來探討中國古代民俗的。本書在研究方法上，既有承前之功，又有它獨到之處。

本書作者李萬春同志，師從華東師大李玲璞教授習古文字，學習勤奮，碩果纍纍，20世紀80年代末即在雲南師大中文係開設古文字學選修課。作者教學之餘，廣泛涉獵我國民俗學，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啓發下，他深入探求漢字與民俗的密切關係。本書所收一百八十餘字及其反映的民俗就是他平時鑽研的成果。

本書通過古文字的形體分析，充分揭示出某些古代民俗的本來面目。如通過“葬”、“弔”等字的形體分析，就清楚地告訴我們古代喪葬習俗的風貌。這是本書的突出貢獻。其次，在分析古文字與古民俗的關係時，對一些古文字的原義作了深入的探索。如對“美”、“孰”等字原義的研究，就撥正了《說文》以來的解釋。再者，作者並不滿足於字形分析，而且在形訓的基礎上，又探本溯源地從古代文獻中引用有關資料，對古代民俗作了充分的印證，這對古代民俗的研究是慎重的，也是必需的。除上述情況外，本書還大量引用我省各兄弟民族的習

俗作比較印證，並且還聯係現實生活的某些習俗，收到以古證今的效果。這在比較民俗學的研究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最後，我們感謝作者，他以清新、生動的筆觸通俗地向我們提供了平時難以學到的古文字學和古民俗學知識的好書。

朱炳淳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日於雲南師大

目 录

修訂再版說明	(1)
序 (一)	李 圃 (2)
序 (二)	朱炳淳 (4)
漢語拼音檢字索引	(1)
緒論	(1)
正文	(13)
主要參考書 (篇) 目	(277)
後記	(280)

緒 論

漢字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瑰寶，世界文化的明珠。從科學的角度說，它是邏輯縝密的結構；從美學的眼光看，它又是奇美無比的佳作。從它產生至今，已有五千餘年的歷史。

在這漫長的歲月裏，它的形體歷經了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楷書、草書、行書等階段的演變，與古文字的形體比較，有的面目全非，本義失却，有的偏旁部首訛變，造成字義理解的困難。漢字形體的演變所出現的訛變現象，歸納起來，主要有分化和混同兩種。分化，是指古文字的一個形體到隸書則分化為許多形體，最顯著的分化有 61 種；混同，是把古文字裏幾個不同的形體混同為一個形體，這種混同達 86 種之多。無論是分化還是混同，都給漢字的學習和運用帶來重重困難。但是，漢字却以它穩固的民族性、縝密的邏輯性、濃鬱的意味性、靈活的生成性、廣博的包容性等特點，贏得了中華兒女的喜愛，走出了困境，記述和保存了世界上最完整的輝煌燦爛的中華文化，發揮了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的凝聚力，保持了漢民族書面語言的統一，進而發展為中華民族的通用文字。其赫赫功勳，昭然若揭。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璀璨，文獻典籍浩如煙海。據乾

隆三十七年始，以十年左右時間，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編纂的《四庫全書》統計，入庫的就有3461種，共計79309卷。存目中的有6793種，共計93551卷。總計為10254種，1728560卷。所收的書是按封建主義的觀點選取的，不符合這個觀點的和符合這個觀點而散佚未能蒐錄到的不知還有多少。僅嘉慶時，浙江巡撫阮元先後就征集到四庫未收的書170多種。從時間上看，《四庫全書》所收僅限于乾隆以前，尤其是元代以前的更多，乾隆以後的都未能收入。就四庫所收的一萬餘種來說，它們的內容十分廣博，有禮儀典章、邊防河渠、醫卜星相、琴技書畫、山川名勝、志怪異聞、音韻訓詁等珍貴資料，這些資料的得以保存、留傳，不能不是漢字的巨大功勞。

中華民族是一個由衆多民族組成的、世界上的古老民族。聚居地域遼闊，語言多種，差別很大。各少數民族有自己的語言，不少還有文字。民族間語言和文字存在差異，與漢語不同。漢語存在地域差別，形成了北方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閩方言、粵方言等七大方言區。其中以閩、粵方言差別最突出，吳方言次之，湘、贛、客家方言最次。與北方方言距離較遠，各方言間基本上或者完全不能通話。漢語方言間的這種差別，已遠遠超過歐洲許多不同民族之間語言上的差別。同一事物，因地而異，如昆明叫蓮花白的一種蔬菜，雲南有的地州則稱京白菜，與四川成都的叫法相同，而湖南長沙叫包菜，廣西桂林叫橙菜，江蘇有的地方叫包頭菜。又如昆明稱“巷”，上海則稱“弄”，北京又稱“衚衕”等。同一個字，地異而音異，或差異很大，如“没”字，僅在距北京不遠的冀東，就有“末”、“木”、“梅”等不同的讀音。湖南人讀作“毛”。《後漢書·馮衍傳》說：“饑者毛食。”唐李賢注“毛，草也”。後用《馮衍集》校勘後說：“衍集作無。”

才糾正了望文生訓的錯誤。句中的“毛”讀爲“沒”的音，作“無”則是“沒”的意義。可見，唐時“毛”和“沒”同音。又如“衣”字，齊國人讀爲“殷”。《禮記·中庸》：“晝戎衣而有天下。”鄭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如衣。”

由於方言不同，一物多名，一字多音，妨礙和影響了思想的交流。但是，漢字有其自身的特點，它以形爲主，一字一音，視而可識，察而見義，盡管方音不同，但對字義的理解總是趨於一致，看到木或水作偏旁的，雖然不能確切了解它的意義，而對與木或水有關的範圍却是清楚的。這對於保持漢民族書面語的統一，漢字的功勞也是巨大的。

漢字適應我國歷史悠久、地域遼闊、方言衆多的國情，自秦以來“書同文”，雖時有古今，地有南北，音有更革，但使用同一的方塊漢字，却能貫通古今，連接南北，漢字起了溝通古今、團結南北，使之成爲一個政治統一體的作用。而使用拼音文字的情況却大不相同。古羅馬人使用拉丁文，他們把自己的語言文字帶到他們自己去過并住下來的地方，時間長了，再加上其他因素，逐漸發生了變化。在意大利半島上的變成意大利文，在伊比利亞半島上的變成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在高盧的變成法蘭西文，在多腦河下游的變成羅馬尼亞文。而拉丁語本身却成了死語言，拉丁文變成了只有專家才認識的，供研究用的文字。日爾曼民族的語言也存在同古羅馬人使用的拉丁文一樣的問題。在德國變成德文，在荷蘭變成荷蘭文，在英格蘭、丹麥、瑞典，則變成英文、丹麥文、瑞典文。這些事實表明：一個民族，如果居住的地域不同、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往往導致文化傳統和心理素質發生變化，一個民族則有肢解爲多個不同的民族，甚至形成許多不同的國家的可能。而漢字却維繫了中華民族的團結和統一，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在現代化建設的發展中，漢字的優越性越來越強地顯示出來。在計算機的運用上，中文電腦的輸入以每分鐘平均 250 個字的速度，超過了英語折合漢字計算僅 210 個的速度，顯示了它的奇妙功能，一展風彩。

總之，歷史和現實的事例都充分展示了漢字的巨大作用和奇異功能，吸引了日益廣泛的國內外專家、學者，香港著名實業家和漢字研究的知名學者安子介先生稱贊漢字是中華民族四大發明之外的“第五大發明”。

目前，一個多層次、跨學科地深入研究漢字的學術活動正在國內外蓬勃掀起，並取得了一定的可喜成果，日本國白川靜先生所著、何乃英先生所譯《中國古代民俗》中的《古代文字與民俗學》、《民俗語彙與古代語言》、《古代語言的漢字》等章節，即是從漢字研究民俗的佳作。它們對於深入研究漢字，從漢字研究民俗極富啓發意義。

漢字是一種“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主觀與客觀“卒然相遇，默然成契”的意音文字，具有廣博的包容性，對於社會和自然界的萬事萬物，無一不包，無所不容。有的學者說，許多古文字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古代生活某些側面的縮影。這是非常精僻的見解。存在產生了漢字，漢字反映了存在，存在與漢字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在一定意義上說，研究漢字就是研究古代社會，懂得漢字也就懂得了古代社會。反之，懂得了古代社會又能促進對漢字的深入認識，比如“女”字，在古文字裏，幾乎都是跽坐的形體，說明古代社會對婦女的歧視，她們的社會地位低下。古代社會“男尊女卑”的思想極為嚴重，孔子曾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他把女子和小人並提，可見對女子是多麼歧視。《尚書·牧誓》：“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真是城門失火，殃及池

魚，歧視婦女禍及母雞，認為母雞不能司晨，如果司晨就招致家庭的衰落、破敗。《詩經·大雅·瞻卬》說“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婦女變成了災星、禍火，使國家敗亡。春秋時，鄭國大夫祭仲專權，國君鄭伯密令其女婿雍糾去除掉他。雍糾把消息洩漏給妻子雍姬，雍姬又把消息告訴了父親。結果祭仲提前動手殺了雍糾。鄭伯感嘆地說：“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同婦人去商量大事，活該掉了腦袋！當了解到古代社會如此歧視婦女時，對於古文字中“女”的形像為什麼如此，理解就更加深刻。舉一反三，對妒、嫉、妾、奴、婦等從女的字也會有新的認識。

又如“樊”，在古文字裏，上面是兩“木”中間有“×”，表示籬笆的形狀，下面是兩隻手，現代漢字作“大”，是訛變的結果。從字形看，它所反映的是用雙手在編籬笆。從古代社會的存在考察，《詩經·齊風·東方未明》“折柳樊圃，狂夫瞿瞿”，說的是奴隸折柳條編籬笆欄住菜果園，而狂夫即奴隸主的監工則瞪大眼睛監視他們。清代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也載：“自沿湖居民或侵填以為居室，或樊植以為園林。”這些記載說明無論“樊圃”還是“樊植”，古代社會存在編籬笆的習俗，“樊”的構形生動、形像，真實地反映了存在。時至今日，我國西南邊陲的廣大邊遠農村和山區，編籬笆欄園子的習俗還隨處可見。

再如“漁”，金文裏有作上面一個“漁”，下面兩隻手的形體，形像地表明人在水中“摸魚撈蝦”，也就是在捕魚。這在古代極為普遍。《周易·繫辭》：“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作網罟既打獵又捕魚。《醉翁亭記》：“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漁，捕魚。成語有“竭澤而漁”，捕魚之俗自古及今，從未間斷，一直保存着。

存在是漢字產生的基礎，即使是意義較抽象的，也都有反映它的漢字產生。如“思”，意義極抽象，是人們的視覺、聽覺和觸覺所不及的。但是，它畢竟是存在的思維活動，漢字也作了反映。這個字從田從心，是字形訛變的結果，從近代出土的戰國後期燕國陶文看，當從囟從心。“囟”，音 xìn，即囟門，又稱囟腦門，也叫腦門，是嬰兒頭頂骨未長攏合縫之處，以部份代全體，用它表示頭腦。從醫學觀點分析，腦是管人體全身知覺、運動和思維、記憶等的器官，而心則是體內推動血液循環的器官，與思維活動並無直接關係，用它與囟組合成“思”，反映了古人對“心”的職能認識的局限，以為它是管思考的。《孟子·盡心》說：“心之官則思。”《詩經·小雅·巧言》也說：“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句中的“心”都是這種認識的反映。雖如此，但這一表抽象意義的“思”始終還是反映了存在。

又如“德”，先民細緻觀察了人的德行，把它的意義濃縮、概括到“德”的結構之中。甲骨文左面是表行動的“彳”（音 chī），右面是一隻眼睛，後來訛變為“四”。上眼皮上有一條垂線，它的意思是行為正，目不斜視就是“德”。金文則進一步豐富了“德”的含義，在甲骨文的基礎上，於眼睛下面增加了“心”字，表示行為正、心術正、目光正就是德。《說文》有從直從心的“德”字，與甲金文可謂殊途同歸，心直、行動正就是“德”。今天，人們常說某人“缺德”，其涵義仍不外乎“不走正道”或“心術不正”之類。《周易·乾》的“君子進德修業”，《荀子·五製》的“無德不貴，無能不官”，《隆中對》的“孤不度德量力”，句中的“德”都是指的品德、德行，也就是走正道、心術正的意思。

再如“孝”，涵義抽象而又廣泛，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無後”即無子嗣，是最大的不孝。所謂“不孝有